

基督教经典译丛



Richard Baxter

The Saints' Everlasting Rest

圣徒永恒的安息

[英] 理查德·巴克斯特 著
许一新 译



基督教经典译



何光沪 主编

副主编 章雪富 孙 毅 游冠辉

The Saints' Everlasting Rest

圣徒永恒的安息

[英] 理查德·巴克斯特 著许一新 译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徒永恒的安息 / (英) 巴克斯特著 ; 许一新译.

—— 北京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3

(基督教经典译丛)

ISBN 978-7-108-04341-2

I. ①圣… II. ①巴… ②许… III. ①基督教—研究

IV. ①B9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2133号

丛书策划 橡树文字工作室

特约编辑 游冠辉

责任编辑 张艳华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3月北京第1版

201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22.5

字 数 200千字

印 数 0,001—7,000册

定 价 39.00元

基督教经典译丛

总 序

何光沪

在当今的全球时代，“文明的冲突”会造成文明的毁灭，因为由之引起的无限战争，意味着人类、动物、植物和整个地球的浩劫。而“文明的交流”则带来文明的更新，因为由之导向的文明和谐，意味着各文明自身的新陈代谢、各文明之间的取长补短、全世界文明的和平共处以及全人类文化的繁荣新生。

“文明的交流”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乃是对不同文明或文化的经典之翻译。就中西两大文明而言，从17世纪初以利玛窦（Matteo Ricci）为首的传教士开始把儒家经典译为西文，到19世纪末宗教学创始人、英籍德裔学术大师缪勒（F. M. Müller）编辑出版五十卷《东方圣书集》，包括儒教、道教和佛教等宗教经典在内的中华文明成果，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了西方各国；从徐光启到严复等中国学者、从林乐知（Y. J. Allen）到傅兰雅（John Fryer）等西方学者开始把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译为中文，直到20世纪末叶，商务印书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其他有历史眼光的中国出版社组织翻译西方的哲学、历史、文学和其他学科著作，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社科书籍也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了中国。这些翻译出版活动，不但促进了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的双向“文明交流”，而且催化了中华文明的新陈代谢，以及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清末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取长补短”的历程，经历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的主导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表现为洋务运动之向往“船坚炮利”，追求“富国强兵”，最多只求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和

物质文明，结果是以优势的海军败于日本，以军事的失败表现出制度的失败。第二阶段的主导思想是“民主加科学”，表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尊崇“德赛二先生”，中国社会在几乎一个世纪中不断从革命走向革命之后，到现在仍然需要进行民主政治的建设和科学精神的培养。大体说来，这两大阶段显示出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由十分肤浅到较为深入，有了第一次深化，从物质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

正如观察一支球队，不能光看其体力、技术，还要研究其组织、战略，更要探究其精神、品格。同样地，观察西方文明，不能光看其工业、技术，还要研究其社会、政治，更要探究其精神、灵性。因为任何文明都包含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不可分割的层面，舍其一则不能得其究竟。正由于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到了20世纪末叶，中国终于有了一些有历史眼光的学者、译者和出版者，开始翻译出版西方文明精神层面的核心——基督教方面的著作，从而开启了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由较为深入到更加深入的第二次深化，从制度层面深入到精神层面。

与此相关，第一阶段的翻译是以自然科学和技术书籍为主，第二阶段的翻译是以社会科学和人文书籍为主，而第三阶段的翻译，虽然开始不久，但已深入到西方文明的核心，有了一些基督教方面的著作。

实际上，基督教对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影响，绝不止于西方文明。无数历史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史家、科学史家、伦理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已经证明，基督教两千年来，从东方走向西方再走向南方，已经极大地影响，甚至改变了人类社会从上古时代沿袭下来的对生命的价值、两性和妇女、博爱和慈善、保健和教育、劳动和经济、科学和学术、自由和正义、法律和政治、文学和艺术等等几乎所有生活领域的观念，从而塑造了今日世界的面貌。这个诞生于亚洲或“东方”，传入了欧洲或“西方”，再传入亚、非、拉美或“南方”的世界第一大宗教，现在因为信众大部分在发展中国家，被称为“南方宗教”。但是，它本来就不属于任何一“方”——由于今日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国

家没有其存在，所以它已经不仅仅在宗教意义上，而且是在现实意义上展现了它“普世宗教”的本质。

因此，对基督教经典的翻译，其意义早已不止于“西学”研究或对西方文明研究的需要，而早已在于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了解的需要了。

这里所谓“基督教经典”，同结集为“大藏经”的佛教经典和结集为“道藏”的道教经典相类似，是指基督教历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师名作，而不是指基督徒视为唯一神圣的上帝启示“圣经”。但是，由于基督教历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师名作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绝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像佛藏道藏那样结集为一套“大丛书”，所以，在此所谓“经典译丛”，最多只能奢望成为比佛藏道藏的部头小很多很多的一套丛书。

然而，说它的重要性不会“小很多很多”，却并非奢望。远的不说，只看看我们的近邻，被称为“翻译大国”的日本和韩国——这两个曾经拜中国文化为师的国家，由于体现为“即时而大量翻译西方著作”的谦虚好学精神，一先一后地在文化上加强新陈代谢、大力吐故纳新，从而迈进了亚洲甚至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行列。众所周知，日本在“脱亚入欧”的口号下，韩国在其人口中基督徒比例迅猛增长的情况下，反而比我国更多更好地保存了东方传统或儒家文化的精粹，而且不是仅仅保存在书本里，而是保存在生活中。这一事实，加上海内外华人基督徒保留优秀传统道德的大量事实，都表明基督教与儒家的优秀传统可以相辅相成，这实在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基督教在唐朝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传入中国，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率宫廷卫队到京城西郊欢迎传教士阿罗本主教，接到皇帝的书房让其翻译圣经，又接到皇宫内室听其传讲教义，“深知正真，特令传授”。三年之后（公元638年），太宗又发布诏书说：“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换言之，唐太宗经过研究，肯定基督教对社会具有有益的作用，对人生具有积极的意义，遂下

令让其在全国传播（他甚至命令有关部门在京城建造教堂，设立神职，颁赐肖像给教堂以示支持）。这无疑显示出这位大政治家超常的见识、智慧和胸襟。一千多年之后，在这个问题上，一位对中国文化和社会贡献极大的翻译家严复，也显示了同样的见识、智慧和胸襟。他在主张发展科学教育、清除“宗教流毒”的同时，指出宗教随社会进步程度而有高低之别，认为基督教对中国民众教化大有好处：“教者，随群演之浅深为高下，而常有以扶民性之偏。今假景教大行于此土，其能取吾人之缺点而补苴之，殆无疑义。且吾国小民之众，往往自有生以来，未受一言之德育。一旦有人焉，临以帝天之神，时为耳提而面命，使知人理之要，存于相爱而不欺，此于教化，岂曰小补！”（孟德斯鸠《法意》第十九章十八节译者按语。）另外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即胡适之和陈独秀，都不是基督徒，而且也批判宗教，但他们又都同时认为，耶稣的人格精神和道德改革对中国社会有益，宜于在中国推广（胡适：《基督教与中国》，陈独秀：《致〈新青年〉读者》）。

当然，我们编辑出版这套译丛，首先是想对我国的“西学”研究、人文学术和宗教学术研究提供资料。鉴于上述理由，我们也希望这项工作对于中西文明的交流有所贡献；还希望通过对西方文明精神认识的深化，对于中国文化的更新和中国社会的进步有所贡献，更希望本着中国传统中谦虚好学、从善如流、生生不已的精神，通过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中基督教精神动力的了解，对于当今道德滑坡严重、精神文化堪忧的现状有所补益。

尽管近年来翻译界出版界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在这方面艰辛努力，完成了一些极有意义的工作，泽及后人，令人钦佩。但是，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千年古国和文化大国来说，已经完成的工作与这么巨大的历史性需要相比，真好比杯水车薪，还是远远不够的。例如，即使以最严格的“经典”标准缩小译介规模，这么一个文化大国，竟然连阿奎那（Thomas Aquinas）举世皆知的千年巨著《神学大全》和加尔

文 (John Calvin) 影响历史的世界经典《基督教要义》，都尚未翻译出版，这无论如何是令人汗颜的。总之，在这方面，国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本译丛的翻译出版，就是想以我们这微薄的努力，踏上这漫长的旅程，并与诸多同道一起，参与和推动中华文化更新的大业。

最后，我们应向读者交代一下这套译丛的几点设想。

第一，译丛的选书，兼顾学术性、文化性与可读性。即从神学、哲学、史学、伦理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学术角度出发，考虑有关经典在社会、历史和文化上的影响，顾及不同职业、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读者需要，选择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

第二，译丛的读者，包括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科学院和各级各类人文社科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高等学校哲学、宗教、人文、社科院系的学者师生，中央到地方各级统战部门的官员和研究人员，各级党校相关教员和有关课程学员，各级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官员和研究人员，以及各宗教的教职人员、一般信众和普通读者。

第三，译丛的内容，涵盖公元1世纪基督教产生至今所有的历史时期。包含古代时期（1—6世纪）、中古时期（6—16世纪）和现代时期（16—20世纪）三大部分。三个时期的起讫年代与通常按政治事件划分历史时期的起讫年代略有出入，这是由于思想史自身的某些特征，特别是基督教思想史的发展特征所致。例如，政治史的古代时期与中古时期以西罗马帝国灭亡为界，中古时期与现代时期（或近代时期）以17世纪英国革命为界，但是，基督教教父思想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仍持续了近百年，而英国革命的清教思想渊源则无疑应追溯到16世纪宗教改革。由此而有了本译丛三大部分的时期划分。这种时期划分，也可以从思想史和宗教史的角度，提醒我们注意宗教和思想因素对于世界进程和社会发展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宜园
2008年11月

中译本导言

威尔金森 (John Thomas Wilkinson)

在基德明斯特城中央立有一座西西里大理石雕成的理查德·巴克斯特雕像，它是英皇家艺术学院托马斯·布劳克男爵 (Sir Thomas Brock) 的作品。雕像的铭文如下：

理查德·巴克斯特

本城在 1641 与 1660 年间

曾是理查德·巴克斯特

的辛劳之地。

巴克斯特以其基督教学识

和忠于教牧职分著称。

在那动荡、分裂的年代，

他极力倡导合一与包容，

向人们指出了通往

“永恒的安息”之路。

此碑为

国教教会与非国教教会

联合共立

主后 1875 年

这雕像是巴克斯特侍奉最高宗旨的象征。他心里时时充满着人类朝圣的意念，唯有在那朝圣之永恒终点的光照下，我们才能明白这朝圣的意义。无论是在他对抗谬误、罪孽的致命打击时，还是在他精准的决疑之中，无论是为教会的统一运筹帷幄时，还是在上层人士中责备灵里的堕落时，巴克斯特始终保持着“时刻心系永恒，时刻准备进入永恒怀抱”之人的姿态。凡其讲解、劝导、反复的说教、一行行的文字、一次次的教训，无不出自他永恒的意识。

这象征还有着另一层意义。它自然而然地将巴克斯特与他的首部——或许也是最伟大的——著作^①联系在一起。正如班扬的名字立即能令人想到他的《天路历程》一样，巴克斯特的名字立刻会使人想到他的《圣徒永恒的安息》（以下简称《安息》），即便我们同时也承认前者的知名度广于后者。巴克斯特是一位著述甚丰的多产作家，然而，是本书使他至少在大多数人心中留名。

—

《安息》一书初版于1650年，也就是在巴克斯特35岁的那一年。其实，本书的大部分是在此前的四五年写成的，因而它出自一位年轻人之笔，而人们却没有普遍意识到这一事实：这不仅是一位年轻人的作品，而且也是一位心力交瘁之人的作品，其原因不止一个。巴克斯特以自己的话描述了本书的成书过程：

健康时，我从未想过要写书，或以讲道之外的其他公开方式服侍上帝。但我一度因大量失血而身体极度虚弱，独自卧病于德比郡的约翰·库克男爵家中我的卧室里，除身边伺候的侍者外别无熟

① 巴克斯特发表的第一部著作是 *Aphorisms of Justification* (1649)，但 *The Saints' Everlasting Rest* 一书动笔时间更早 (R. B., I. 107)，正如他自己所述：“我撰写的第二本书（动笔却是最早的）是称作《圣徒永恒的安息》的那一本。” (R. B., I. 108)

人，且被医生们判了“死刑”。那时，我开始就圣徒永恒的安息做更认真的默想，因为据我所知，我自己已置身于今世与永恒的临界上了。为使自己默想的思路不过多地分散，我便动笔就此主题写些东西，只是想写一两次讲道的内容……可我的病弱状态迟迟未得缓解，彼处又没有其他书籍供我阅读，也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我便继续就上述主题写作，最终扩展为后来发表的大部头。^①

此描述写于1644年，即作者以为自己死期将近的日子过后约十五年，这与作者就本书的题献辞（日期为1649年1月15日）^②中所述是一致的。题献中写道：

我开始潜心思考自己的永恒安息之时，正在远离家乡的某处栖身。先前多年的虚弱之后，我因骤然失血一加仑而陷入极度的虚弱之中，身边无一熟人，除圣经外，手边别无书籍可供参阅，且在日日等候死亡的到来；我因极度虚弱，我的记忆力不佳，遂提笔开始为自己的葬礼草拟讲道词，同时助自己默想天国，以使余生和死亡皆不成为苦事。

正如他更详细的说明中所示，作者因施行当时流行的“潜水员救治法”而使身体状况恶化。他写道，他到库克男爵家时，“正值严寒多雪的季节。是严寒，加之其他偶然因素造成了我的鼻子出血。当血流到一两夸脱时，我切开了四条经脉，但无济于事。我又花了几天时间，用潜水员的其他救治法，也未见功效。最后，我做了一次彻底清肠才将血止住。大出血使我衰弱至极，外观大变，以致熟人前来探望我时几乎认不得我。”^③

① R. B., I. 108.

② Infra, pp. 23–24.

③ R. B., I. 58.

无怪乎，他那时视自己为死期已近。正是在身体如此孱弱之际，他开始了本书的写作。但令作者的生活陷于困顿的还有其它原因。当时的大背景是英国内战正酣的几年间。巴克斯特“蒙上帝恩召”在基德明斯特的侍奉始于1641年，因其侍奉颇有成效，他发现自己的工作“结出了最丰硕的慰藉之果”^①，可战争的爆发已打断了他的工作。因该城内“凶暴之甚”，巴克斯特奉友人之劝撤出了基城，来到格洛斯特，经一个月的暂离后又回到基城。之后不久，因受到更多暴力的威胁，他再次撤离，直到六年后才回去。这数年间，作者经历了许多的艰难困苦，对此我们有必要简略提及。

他离开基城后的第一个礼拜日，在奥塞斯特讲道时，听到埃奇希尔之战（1642年10月23日）的消息。次日上午，他“想见识前一天作战的现场”，便行至埃奇希尔，“只见约千具尸首遍陈于双方阵地”，还有不少尸体已经掩埋，而损失惨重的两军仍在对峙之中。巴克斯特一时不知日后该何去何从。

当时我真不知自己该走哪条路好。住在家里我感到不安；但特别是在当时，这方或那方的士兵们经常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仍只能听那些时刻可将我们当猎物的野兽的摆布。我既没有钱，也没有朋友在身边：我不知有谁能接待我到任何安全之所规避，而且我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换得人们为我提供衣食所需。^②

在人们的劝说下，他搬到了考文垂，盼望着战事早日结束。他在清教徒牧师西门·金（Simon King）那里住了一个月。战火仍在延烧，他又搬到“地方官的宅邸暂住，并在那里为士兵们讲道”。传到该城的

① R. B. , I. 58, p. 20.

② 同上, p. 43.

只有战争的消息，而传来的消息都令人心焦。

我住在那里时平安无虞，如同在干爽的室内听着户外风雨交加。我们每日听到的都是关于这场或那场战事，这兵团或那兵团打胜仗或打败仗的消息；两次纽伯里之战，格洛斯特被围，惊心动魄的普利茅斯、莱姆、汤顿拉锯战，威廉·沃勒爵士的胜败；纽瓦克失守，博尔顿的大杀戮，规模最大的战事是约克一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样听闻此一方、彼一方的悲惨消息便是我们每日所做之事，以致我每天早上醒来都会有人前来告诉我，某个兵团胜了或败了，哪方打败了对方或被对方打败；“你有没有听说这消息……”这往往就是我每天听到的第一句话。在那些血腥的日子里，谁能杀死最多的敌人，谁就最光荣，情况实在是糟透了。^①

困扰着巴克斯特的还有属于他个人的挂虑。在什罗普郡，他父亲虽远谈不上干预敌对的双方的事，却在被皇家士兵洗劫之后，投入了利勒舍尔的监狱。^②

内兹比战役（1645年6月15日）的消息，为巴克斯特带来了一次大变动。在一次参观内兹比战场之后，他造访了位于莱斯特的国会派军队总部，一是为打探军中某位老友的下落，二是为了解他更为关心的事。他十分担心军中的信仰状况，因为他听说克伦威尔军队的士兵正在一些危险观念的威胁之下。问题倒不在于军中有恶行，这类问题很少或说根本不能在克伦威尔的军队中有市场，问题出在思想观念上，同时还有对这些观念过于随意的表达。他就此写道：

① R. B., I. 46.

② 同上, p. 44.

我发现军中有不少诚实的人判断力很弱，又对某些事务知之甚少，却被诱发出争执的态度，而且太热衷于为这种或那种观点辩论；时而为国家民主，时而为教会民主，时而反对某些祷告形式，时而反对婴儿洗礼……为之争论最多、最烈的还是他们所谓的“良心自由”，即民事管理职能无权以强制或约束的手段决定任何宗教事务，相反，每个人都可以在宗教问题上不仅自由地信守，而且可以自由地传讲、行事。^①

巴克斯特认为，他从中觉察到一种不仅对法律和秩序，且对教会和国家都十分严重而紧迫的危险，军中比较极端的势力一旦控制了局面，就有可能打开革命行动之门。

如此情势将巴克斯特引向了一项新的严肃使命。友人华雷上校的兵团为他提供了军牧一职，他接受了聘任，因为他相信，其他福音执事未能在军士的属灵需要方面尽责，而他自己也因忽略了如此情势而未曾履行这一责任。也许有所作为的时间已过，巴克斯特的幻想也很快破灭，陷入了绝望——最出人意外的是，事情从一开始便如此。

刚到部队，奥利弗·克伦威尔就很冷淡地迎接我，我在那里期间，他再也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也从未给过我一次机会到军官们议事、开会的总部去，我的计划因此大部分都落了空。他的秘书还宣布，有位改革宗的牧师要到军中来唤醒军士们，以解救教会和国家。^②

他由此察觉到那里存在着对他的敌意。华雷上校虽然欢迎他，但其

① R. B. , I. 46, p. 53.

② 同上, p. 52.

他人因此就更不理睬他。

在接下来的两年间，巴克斯特目睹了多场战事，^①变得心力交瘁。最终健康的崩溃结束了他在军中的辛劳，到末后，他相信自己了悟到，就此为止才是上帝的旨意。

上帝反对此事的定意再明显不过了……我后来发现，这次大受痛苦是上帝对我的怜悯；因为他们是那样强大有力，乃至我若想在自己的尝试中获得小小的进展，都会在他们的狂暴中送命。于是我最终离开了军队。^②

是在此意义上辛劳无果、心力交瘁的情形下，巴克斯特来到了位于德比郡墨尔本的约翰·库克男爵家中，也是在此情形下，他写下了《安息》一书。了解此背景很重要，因为这是读懂本书许多章节之门径。“由身心疲惫而来的忧伤或多或少地可见于全书，特别是一些最具如此特征的章节。”^③

以下片断便显示出那战争是多么令作者痛心：

四年间，我亲眼所见的景象是何等的令人心碎啊！在一次战役中，一位亲爱的朋友在我身边倒下；在另一次战役中，一位宝贵的基督徒因伤或死去而被抬下战场；我几乎没有一个月、一个礼拜不看见流血的景象，听见流血的消息。在天上却绝不会有这等事情发生。到那时，我眼前不会再满是在伍斯特、埃奇希尔、纽伯里、南

① 在兰波特战役（1645年7月10日），围困布里奇沃特（7月23日攻占该地），对布里斯托尔的最后攻击（9月11日）——这期间巴克斯特“害了热病”，致使他“非常消瘦而衰弱，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恢复了先前有的一点体力”；在围困埃克塞特（1646年4月13日投降）、围困牛津（1646年7月24日投降）、围困班伯里（长达两个月才于1646年5月9日攻陷），还有围困伍斯特（终于1646年6月22日攻占该城）的十一周中大部分时间里，巴克斯特都在场。

② B. R., I. 59.

③ Powicke, p. 8.

忒维奇、蒙哥马利、霍恩卡瑟、约克、内兹比、兰波特等地所见的景象，也不会再为此——厮杀过后尸陈遍野——伤痛欲绝。请看英格兰的喋血四年，兴旺的国家几成废墟；请听全国多数城市、市镇、乡村，传出的只有战争的消息；请判断其中是否不存在悲伤的理由吧！特别是看到这可悲的结果：一场大好的变革，本可借此达到极好的预期，可人心却变得愈加愚昧。这难道还不该令人伤心不已吗？——对未来的担忧令我们揪心，这难道不比我们看到或遭遇的一切更糟吗？——想到福音正在远去，荣耀离开了以色列，如太阳中天陨落，可怜的灵魂情愿留在黑暗、贫穷之中，只能冒着极大的危险才能发出领人得救之光。想到这些该是多么的让人悲哀啊！^①

更令巴克斯特伤怀的是“我们可悲的分裂和毫无基督样式的彼此争吵”。他心里想到的特别是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罅隙，他多么盼望两者能合一，以使双方能在合一的教会中同享福音的好处。在作者看来，入侵苏格兰是一场悲剧；克伦威尔呼吁全国为他的进攻获胜而禁食祷告，为他在邓巴打的胜仗而谢恩，这在巴克斯特看来也是可悲的事。以下章节便表达了他的如此感受：

身处战争年代，人们对未来的憧憬该是多么甜美！我曾应许给自己的灵魂以充分的满足——那时我将享受和平，看到福音得到大力广传，所有法令都得洁净，真正的纪律能在教会实施，愚昧都得医治，一切逼迫全都停止，讥讽者之口被堵住——这些人以让世界充满对基督的偏见阻止人们归向基督。可眼下，我曾对灵魂应许的安息在哪里？曾期望带给我最大满足的，如今甚至成为我最大的悲哀。我们身边是流血，而不是和平；非但如此，事实表明流血的还

①（英文全文版）S. E. R. (2nd edn), Pt I, ch. 7, §xv.

是圣徒。曾受联合誓约约束的两个国家曾是世上基督影响力（就教义、敬拜的纯正而言）的一大组成部分，如今两国却彼此残杀，使无数人的灵魂无端离开其身体，而杀害他们的竟是盼望同他们永远在天国里欢喜快乐的人。^①

我们在另一章节中也发现了同样发自内心的呼喊：

这些使我认真地这样说，也这样想：圣徒在荣耀中安息的日子该有多么幸福甜蜜啊！因为上帝、基督、圣灵只有一位，那时我们将受同一审判，将有合一的心，合一的教会，合一的侍奉，直到永远！那时不再有受割礼与未受割礼的、犹太人与外邦人、重浸派或婴儿浸礼派，以及布朗派、分离派、独立派、长老会、国教派等等之分；唯有基督乃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那时我们无须再犹豫该加入哪个教派或遵从哪种敬拜条例……可悲的是，连土耳其人和异教徒都能联手作恶，置身真理之中的基督徒们却自愧不如！……然而令我欣慰的是，如今对我投以冷淡目光的老朋友，终将与我同一安息中快乐欢喜。^②

而使巴克斯特心力交瘁的另一原因——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最深层的原因——则是他自身所经历的忧伤，他渴望着从中得到解脱。

我们的眼睛、耳朵里几乎全身都爬满了悲哀！有哪一部分能得幸免？各种担心啮噬着我，使我的快乐黯然失色，犹如冰霜冻伤了

①（英文全文版）S. E. R. (2nd edn), II. 9. 在巴克斯特修订的第七版中，作者加了以下边注：“此处所写是指苏格兰的战争……以及一项法令，命所有不为他们打胜而禁食祷告或谢恩，不在任命中寻找上帝的牧师引退；另有一项命令是要赶走各城市、集镇、要塞所有不与他们签约的传道人。”

② 同上，I. 7. XIV.